

# 波希米亞王國招募德意志人政策及 捷德民族問題的源起

杜子信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摘要

中古高峰時期，因波希米亞王國為了境內疆域開發，招募大批具有專業技能的德意志人入境拓殖。此項政策推行數十年之後，使其時的波希米亞王國全域普獲開發之利，在大量稅收挹注下，不僅使該國歷朝諸君藉此而強化其王權，同時亦使波希米亞王國成就德意志乃至於中東歐地區一方之霸的地位。當然在大批德意志人移入並紮根波希米亞王國全域之後，德人聚集區逐步也由量變而產生質變，德意志人成為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人口結構中具有相當比重的地位。其後從中古一直至現代，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歷史上，捷克人與德意志人的頻繁互動成為常態，在這長達 800 年的歷史中，曾經長期和平依存的雙方，在進入近現代之後，卻因近代民族主義浪潮的波及，逐步由和平至爭端、由磨擦而至衝突，終而發展至仇恨敵對態勢。本文將以去民族主義化的視角，擬由捷德兩民族從中古以來的互動開始，具體剖析這段歷時數百年之久的捷德民族關係史，希冀解開近現代複雜的中東歐地區民族衝突問題的其中一環——德捷民族鬥爭及蘇台德問題之源。

**關鍵詞：**波希米亞王國、摩拉維亞、捷德民族關係、蘇台德問題

## 壹、前言

自從 10 世紀初期散居於今日捷克境內的各支西斯拉夫人，由部族林立態勢而逐步走向統一的國度：波希米亞公國之後，該國度始終與西鄰的德意志王國暨德意志第一帝國<sup>1</sup>（神聖羅馬帝國）關係密切。由於當時正逢德意志王國肇建國勢鼎盛之期，再加上西方羅馬教會在德意志境內的各大主教區欲積極向東部傳播基督教義，使得波希米亞公國從立國之初，持續受到來自德意志的政教壓力，最後在 10 世紀中期時，波希米亞大公終而向德意志第一帝國稱臣入貢，其後在 12 世紀時則受封而成為波希米亞國王，至此波希米亞王國成為德意志第一帝國組成之一部（Augustynowicz, 2010: 34）。

儘管作為一個實質獨立王國地位已然不再，然而被納入德意志第一帝國的波希米亞王國，卻自 12 世紀開始，逐步在德意志世界之中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其因在於其境內蘊藏豐富礦藏，得利於此項利基，因而波希米亞王國「普熱米索王朝」（Přemyslid Dynasty, 922-1306）歷朝諸君，亟欲大舉開發各類貴重礦藏及進行境內各地的疆域開發，俾增加王室稅收，遂大批招募當時深具成熟高效率的農礦工商經驗的德意志人入境，使之推動

<sup>1</sup> 919 年，東法蘭克王國所在的德意志境內，五大部族公國選出薩克森部族公國公爵亨利希一世為王，是為德意志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薩克森王朝」（Saxon/Ottonian Dynasty, 919-1024）。在此期間，東法蘭克王國逐步質變為德意志王國。其後德王亨利希一世之子鄂圖一世（Otto I, 962-73）因在 955 年重創馬札爾人的侵略而捍衛西方羅馬教會的信仰與版圖，於在 962 年為羅馬教宗加冕為帝，以德意志領域為其立國所在的這個帝國，其正式國號最初為「羅馬帝國」（*Romanum Imperium*, Roman Empire）。時至 1157 年「霍恩史陶芬王朝」（Hohenstaufen Dynasty, 1138-1254）的「紅鬍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 1155-90）在位之時，將國名改為「神聖帝國」（*Sacrum Imperium*, Holy Empire）。其後至 1254 年史陶芬王朝結束之後，國名再次更動為「神聖羅馬帝國」（*Sacrum Romanum Imperium*, Holy Roman Empire）。直到 1486 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Holy Roman Emperor, 1452-93）在位之際，因帝國領域縮小僅侷限於德意志，遂又再次更名為「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Sacrum Roman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 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基於此一帝國的正式名稱在歷史發展上不斷更易變動，在援引之際常因時空變化而不勝其擾，因而本文直接採用德意志第一帝國之名，如此用法較符合德文史著上以「德意志國」（*Deutsche Reich*, German Empire）之名來涵蓋千餘年德意志人在其領域上的發展，凸顯德意志歷史發展上的一致性，亦較符合許多國內外的史著上以第一帝國、第二帝國及第三帝國來分別稱呼 962 至 1806、1871 至 1918 及 1933 至 1945 年的德意志人國家的用法（杜子信，2014a：234）。

波希米亞王國全域的屯墾拓殖。此種背景下，遂有大批德意志人受邀而進入了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各地，在大批的德意志人的進入波希米亞王國之後，在緊接下來的 200 年，透過他們在各領域的專業技能，使得波希米亞王國的農、礦、工、商等皆獲得長足的發展，甚至發展為德意志第一帝國境內富庶繁華之地，此由 14 世紀中期以後，晉升德意志第一帝國境內最重要的政治要角：波希米亞王國歷史上的第二個王朝「盧森堡王朝」尤為顯例。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在兩個世紀中移入的德意志人數量鉅大之故，致使波希米亞王國的族群結構在此一過程之中，由量變而產生質變，波希米亞王國的某些地帶、尤其是環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週遭的山群地帶及各大城市，德意志人的數量在這兩個世紀之中，逐漸凌駕捷克人之上而成為人口的多數，此即「德意志化」(*Eindeutschung*) 的歷程。亦由於大量德意志移民者的移入及逐步掌控了政、教、經、社、文等各領域的優勢地位，使得波希米亞本土的捷克人愈來愈淪為各方面的弱勢，長此以往，使其對德意志外來移入者不滿情結愈見增長。最後這股不滿情緒，終於在 15 世紀初時，藉由胡斯宗教改革不成而所引發的胡斯戰爭中，大舉爆發開來，導致大批德意志人在戰亂期間被殺被逐。胡斯戰爭可謂是捷德民族勢力在波希米亞王國的轉折點，該戰爭象徵著捷克民族免於走向德意志化的境地，並得以使之在後續年代中持續長存。不過儘管德人勢力在波希米亞王國的核心地帶受到抑制，然而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週遭山群地帶的德意志人分佈區則不受影響，在後續年代中仍維持其在山區地帶的相對多數民族地位。

其後歷經 16-18 世紀哈布斯堡王朝對波希米亞王國的長期控制，在操德語且居於統治地位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長期統治下，波希米亞的德意志人相對於捷克人而言，重新建立起在各層面的優勢地位。此種情形在進入 19 世紀中期之後，隨著近代民族主義浪潮席捲中東歐各地之後，遂造成捷德民族鬥爭問題，此一民族衝突甚至直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一次世界大戰後解體而無由可解。

一戰結束後，在協約國主導下，波希米亞德意志人所在的山群地帶被劃歸新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之中，旋成為該國內部長期的少數民族問題，其後在希特勒 (Adolf Hitler, 1933-45) 及其國社黨人 (*Nationalsoziale*

*Deutsche Arbeitspartei, NSDAP*) 的操弄之下，遂有蘇台德德意志人問題的產生。最後在西歐列強的綏靖政策下，蘇台德地區終為德意志第三帝國所奪，亦代表了二次至界大戰的爆發已無可避免。直迄二戰結束後，透過德國的戰敗及戰勝國對歐陸新秩序的劃分，將 300 多萬的蘇台德德意志人逐離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之後，捷德民族問題才宣告終結。

本文將就捷克人歷史的初興、波希米亞王國歷代的簡要發展、捷德民族互動的歷史源起，以及在歷史進程中兩民族由毗鄰而走向摩擦衝突的發展，做深入的探究，期能一解近現代捷德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

## 貳、波希米亞早期族群分佈、基督教化及捷克人建國

今日構成捷克共和國的主體民族捷克人 (*Češi, Czechs*)，係屬西斯拉夫語系 (*West Slavic Languages*) 族群，不過捷克人的進入今日中歐地區，實是 6-7 世紀以後的事 (*Bahlcke, 2009: 114-16*)，在此之前居處在中歐至中東歐之地的最大族群，實為日耳曼 (*Germanic*) 諸部族。日耳曼諸部族最早的棲息地原在斯堪地那維亞 (*Scandinavia*) 及日德蘭 (*Jutland*) 半島，時約在紀元 2000 年前後之期。其後因北方氣候嚴寒及人口過剩而逐步南遷，歷經逾千餘年的不斷分衍之後，至紀元前 1000 至 600 年間，先後分出三大群體：即居處於原鄉的「北日耳曼人」一分衍為日後的丹麥人、挪威人、瑞典人及冰島人；遷居於北德低地及萊茵河下游地帶的「西日耳曼人」一分衍為日後的德意志人、尼德蘭人、法蘭德爾人及英格蘭人；以及東遷至維斯瓦河到黑海之間的「東日耳曼人」—包括哥德人、汪達爾人及布根地人 (*Davies, 1996: 222*)。時至紀元 4 世紀左右，因東日耳曼部族中的東哥德人受到由歐亞大草原西遷的匈人 (*Huns*) 攻擊，引發一連串的骨牌效應，這些以東哥德人、西哥德人、汪達爾人及布根地人為主的東日耳曼部族遷入羅馬帝國，尤其是西帝國各行省，令西帝國當局政經社形勢為之大亂，最後該地族群結構由量變產生質變的情形下，這些日耳曼部族終在與西帝國各省地方勢力作結合後，紛紛建立起日耳曼諸國度，遂導致西羅馬帝國於 476 年無聲無息地結束 (*Demandt, 1998: 142-52*)。

東日耳曼人的遷出今日的中東歐及東歐之地，導致後來斯拉夫人的外遷擴張行動，對於後來中東歐、東歐及東南歐斯拉夫世界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由於東日耳曼諸部族西遷之後，中東歐至東歐地區形成了一大片遼闊無人地帶，使得原本棲息於今東歐地區的普里配特沼澤區（*Pripet Swamp*）的斯拉夫人（*Slavic*）諸部族，遂逐步向外播遷。約與此同時或稍後之際，另一支源自內亞草原的土耳其語系游牧部族阿瓦爾人（*Avars*），在 6 世紀時一路由東歐大草原向西侵入了中東歐及中歐地區，在其西進的過程中，裹脅大批的斯拉夫人而前行，充作其軍伕及奴隸，無形之中也加速並擴大了斯拉夫諸部族外遷的步伐。

與日耳曼諸部族之分劃類似，人類暨語言學者亦將斯拉夫部族分劃為三：即向西遷入中歐的「西斯拉夫人」—包括波蘭人、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朝南移向東南歐巴爾幹半島的「南斯拉夫人」—包括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黑山人、波士尼亞克人等等；以及朝向東北及東南遷徙的「東斯拉夫人」—包括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Davies, 1996: 1233*）。就在斯拉夫諸部族逐步向中歐、東南歐及東歐擴張散播之際，亦因地緣關係之故，使這些斯拉夫部族分別受到來自西方羅馬教會，以及東方拜占庭教會的基督教會要求皈依的壓力，其後更由於西東教會陣營各自結合西方法蘭克王國及東方拜占庭帝國的政軍力量，使得各支斯拉夫諸部族在 9-10 世紀的進程中，逐步皈依西方或東方教會。

最初西斯拉夫諸部族移向今日中歐各區域，隨即因地理環境之故而分衍為日後的捷克人、波蘭人、斯洛伐克人及溫德人。西斯拉夫諸部族所建立起的第一個國家組織係大摩拉維亞公國（*Great Moravia, 833-907*）（*Fritze, 1982: 109*）。然而該國度的國祚為時並不長久，由於始終受到西方的東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East Franks, 843-962*），以及 9 世紀從歐亞草原西遷而來的馬札爾人（*Magyars*）的持續入侵，這個國度僅維繫至 907 年即告不支亡國，不過由於大摩拉維亞公國立國所在的核心地域在今日的斯洛伐克之地，遂使斯洛伐克人對這段歷史過往甚感榮耀，認定其祖先建立起斯拉夫人的第一個國家組織，這在 19 世紀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興起之後，成為斯洛伐克民族鬥士引以為自豪的史跡，並以之作為日後斯洛伐克人追求獨立

自主時的精神力量。

就在馬札爾人長驅直入大摩拉維亞公國各地而導致其土崩瓦解的歷程中，處於該公國邊陲地帶的波希米亞地區，因其週遭群山環抱而能倖免於馬札爾人兵燹之禍，亦在此種外敵環伺的嚴峻威脅下，致使該地區的西斯拉夫部族漸由林立之態而逐步走向統一的政治單位。時至 922 年，波希米亞地區終於出現了捷克人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組織：波希米亞公國「普熱米索王朝」（*Přemyslid Dynasty, 922-1306*），首位大公文瑟斯勞一世（*Wenceslaus I, Duke of Bohemia, 922-35*）在皈依西方教會後，正式於首都布拉格建立一座教區。不過布拉格教區在當時並非是獨立的教區，而是受到西鄰甫從東法蘭克王國轉變而來的德意志王國（*Deutsches Königreich*）雷根斯堡主教區管轄，在當時政教關係緊密的時代背景中，布拉格教區就意謂著雷根斯堡主教區所屬的教會省，不啻亦代表普熱米索王朝事實上係居於德意志王國的從屬地位。即因此故，普熱米索王朝中人在後續年代中，不斷地爭取布拉格教區地位的提升，係因此舉若終底於成，則意謂著波希米亞公國贏得其獨立自主地位。

儘管在文瑟斯勞一世的統治下，建立起捷克人的第一個國家組織，然而由於普熱米索家族內部涉及於統治權的激烈權鬥，最後導致在 935 年時，文瑟斯勞一世橫遭其兄所謀殺。自從大摩拉維亞公國滅亡之後，波希米亞公國的文瑟斯勞一世，是廣大的斯拉夫世界統治者中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君主，因而在其亡故之後就被羅馬教宗追諡為聖者，使其擁有首位斯拉夫人受封聖者的殊榮地位。再加上文瑟斯勞一世生前極力爭取波希米亞公國的獨立自主地位，使得文瑟斯勞一世於後世捷克人心目中擁有至尊無上的地位，甚至臻於神聖化境界，這可由捷克人稱呼自身國度為「聖文瑟斯勞王冠下的領地」（*Land of the Crown of St. Wenceslaus*）可觀察出。日後凡被選為波希米亞國王者，皆須在首都布拉格舉行「聖文瑟斯勞王冠」加冕儀式。在 19-20 世紀的捷克民族主義高漲期間，聖·瓦茨拉夫尤成為推動捷克民族運動的最大精神動力。

雖然在文瑟斯勞一世及後繼者的統治下，欲一再凸顯波希米亞公國的獨立自主地位，但來自西方德意志王國的政軍壓力始終強大，普熱米索王

朝終在 950 年時為德意志王國「薩克森王朝」鄂圖一世所擊敗，布拉格教區雖被提升為主教區，但卻被直接歸屬於德意志境內的麥茵茲大主教區所管轄。11 世紀初，普熱米索王朝短暫擺脫臣屬關係，然而隨即又被德意志第一帝國所征服。至 12 世紀中期之時，波希米亞大公弗拉提斯拉夫二世（Vladisav II, 1158-73）派兵參與德意志第一帝國腓特烈一世的進軍義大利之役，作為酬謝，遂被敕封為波希米亞世襲國王，使得波希米亞被提升成為王國（Augustynowicz, 2010: 34），正式列名德意志第一帝國所屬的 4 大王國：德意志王國、義大利王國、布根地王國及波希米亞王國，並自此之後逐步發展成為德意志第一帝國境內重要政治單位之一，甚至在 13-14 世紀時進一步躍升成為德意志第一帝國的政、經、社、文重心之所在。由波希米亞王國納入德意志第一帝國及其在德意志歷史上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不難看出波希米亞王國在德意志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地位。

### 參、普熱米索王朝的德意志移民政策及波希米亞開發

自從波希米亞王國納入德意志第一帝國之一部後，普熱米索王朝與德意志世界之間的關係愈形緊密。從 12 世紀中期開始，由於波希米亞本土貴族勢力日益坐大，甚至透過不斷擴張其特權而侵凌王權，普熱米索王室已然出現中央君權逐步衰凌的隱憂。為了對抗境內桀傲不馴的本土貴族，普熱米索王朝歷朝諸君頗思援引對抗力量，於是此際西鄰德意志地區的身懷專業技能、卻陷入存續危機的各階層人民遂成絕佳援引對象。此際德意志地區之所以出現大批民眾生存危機，實因人口過剩所導致，在此必須回溯至中古盛期（High Middle Ages, 1050-1325）的 11-12 世紀時代背景作觀察。

時序進入中古初期至中古高峰期之交時期，中西歐各地由於農耕器具的改良、採礦技術的精進、城市群的興起、以及商業社會的興旺，使得中西歐的人口總數呈現劇增之勢。然而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之後，至 12 世紀中期左右，德意志及歐陸西部的農業生產力已臻當時農業技術所能供給糧食的極限，致而出現饑荒赤貧等人口過剩的現象。正值此際，包括波希米亞王國在內的中東歐各國君主，由於積極想要進行境內各地區的疆域開發，

俾增加王室稅收，乃因而向西鄰的德意志各地區人民大張歡迎之手，於是受生機所迫的許多德意志人，遂離開其西部原鄉而移向中東歐各地區，此項行動即是中古時期（Middle Ages, 500-1500）的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Deutsche Ostsiedlung*）運動（Dralle, 1991: 24-43）。

波希米亞普熱米索王朝諸君即由 12 世紀後半期開始，大力召喚德意志移民東移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其主要目的有二，除了前述所提及的，欲藉德意志移民的較有效益的技能來進行王國全域的疆域開發，厚實王室財政收益之外，第二項重要的動機則是希望引入德意志移民作為助力，用以對抗境內不斷坐大的本土貴族侵凌王權（Grundmann, 1973: 270）。此種背景下，從 12 世紀中期至 14 世紀前期的超過 150 年之期，有大批的德意志人陸續移向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德意志農民及礦工在此一期間內，逐步開墾了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週遭山群地帶，而德意志市民階級亦對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各大城市的建造，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與此同時，德意志神職人員亦入主了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各大重要主教座堂及教區。凡此種種，皆使波希米亞王國在此一期間中，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殷實富饒的國度。

至此普熱米索王朝的招募德意志人入境開發政策，可謂發揮了當初王室所殷切期盼的結果，不僅各大城市的熱絡商業活動及山區地帶的疆域開發所帶來的大量稅收，令普熱米索王朝的府庫財政為之富裕，同時各大城市之中的德意志市民階級，亦逐步發展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使之得以襄助王室中央而對抗聲勢喧囂的本土貴族。得利於此種利基，遂使普熱米索王朝重振了一度衰凌的王室中央威望。

普熱米索王朝的招募德意志人政策，尤其在歐塔卡二世（Přemysl Ottakar II, 1253-78）統治期間達到最巔峰之期。歐塔卡二世有「鐵金國王」（*král železný a zlatý*）的外號，此一稱謂即源自他坐擁鉅額財富而打造出一支冠絕斯時的重裝騎兵隊而來，而其雄厚的王家資產，即因他大力引入大批專業技能的德意志礦工，開採在 13 世紀甫發現未久的一條重要的中歐銀礦脈使然。這條從摩拉維亞的伊赫拉瓦（Jihlava），延伸至波希米亞的庫特納霍拉（Kutná Hora）的銀礦苗帶，開採未久之後迅速發展成為全歐最重要的銀礦產區（Hilsch, 1989: 317）。透過採礦技術先進的德意志礦工群的開

採及銀幣的持續供輸，使得普熱米索王室的府庫為之滿溢。此一利基，自然而然地強化了歐塔卡二世的政治聲威及影響力，使其不僅在波希米亞王國境內的地位雄視於萬民之上，貴族世胄皆不敢撻其鋒，甚至大力向外擴張波希米亞王國的版圖（Augustynowicz, 2010: 36）。1246年，他利用奧地利公國第一個統治王朝「巴本貝格王朝」（House of Babenberg, 976-1246）的統治者對外戰歿之際，藉由姻親之故而宣示擁有該公國的全部領地繼承權，其後在擊敗勁敵匈牙利王國的挑戰後，正式取得上奧地利、下奧地利、徐泰爾邊區及克萊恩等地，儼然形成了德意志第一帝國境內聲勢最強大的一方之霸。在志得意滿之餘，歐塔卡二世進而欲一展鴻圖於德意志政局，期望取得德王之位，並進一步加冕為德皇。

然而面對政經實力如此強大的波希米亞國王歐塔卡二世，頗令德意志境內各大選侯為之憂慮不已，深懼一旦歐塔卡二世被選為德王而入主中央之後，勢將以其強勢威嚇之態，危及各據一方的各大選侯。於是為了維繫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德意志各大選侯乃在1273年的法蘭克福帝國選侯會議上，選出政治實力較弱的哈布斯堡家族魯道夫一世（Rudolf I of Germany, 1273-91）為新任德王，並賦予其奧地利公國的封地。魯道夫一世的當選德王並獲允奧地利公國之地，引起本早已將德王頭銜及奧地利公國視為囊中物的歐塔卡二世強烈不滿，於是普熱米索家族與哈布斯堡家族間的軍事衝突遂告不免。雙方歷經數年的招兵買馬及拉攏各方後，終於正式在1278年的摩拉瓦河/馬希河原野（Marchfeld）上的杜倫克魯特（Battle of Dürnkrut）對決，然而出人意料之外地，歐塔卡二世竟在是役中戰敗身亡。歐塔卡二世的戰歿，亦使普熱米索王朝君主欲入主德意志第一帝國的雄心為之功敗垂成（Helmedach, 2009: 391）。時至1306年，該王朝末代國王瓦茨拉夫三世（Wenceslaus III of Bohemia, 1305-1306）橫遭政敵所謀殺後，波希米亞第一個王朝普熱米索王朝正式告終。

## 肆、盧森堡王朝崛興及波希米亞王國晉升德意志中樞

普熱米索王朝斷嗣之後，出身德意志西部的盧森堡家族「盲眼」約翰（John of Bohemia, 1311-46）因其妻系出瓦茨拉夫三世之妹，遂在 1311 年被選為波希米亞國王，開啓波希米亞王國歷史上的第二個王朝「盧森堡王朝」（Luxemburg Dynasty, 1311-1437）之始。約翰在位之時，積極打造盧森堡王朝在全歐的聲勢與地位，他向有騎士國王的稱謂，在「騎士文化」（*Ritterkultur*）盛行的中古高峰至晚期之時，終年領軍在外作戰，從而為盧森堡王朝建立起不朽的威名。亦因其戰功彪炳之故，最後迫使北方長年勁敵屈服，1335 年時，波蘭王國「皮雅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 966-1370）國王卡齊米日三世（Casimir III the Great, 1333-70）被迫與約翰簽約，正式承認波希米亞王國合併北方原屬波蘭的西利西亞（Silesia），使得波希米亞王國盧森堡王朝的版圖在約翰的統治下大幅向外擴增。

終約翰統治之世，雖仍有德意志移民陸續移入波希米亞各地，然而規模明顯日漸縮減，主因在於從進入中古晚期（Late Middle Ages, 1325-1500）的 14 世紀前期開始，全歐氣候明顯轉冷，進入了所謂「小冰河」時期。此一期間內，中西歐至西北歐各地暴雨洪水肆虐，在各類農產品收成大減下，導致中西歐及德意志西部各地出現飢貧交迫、甚至填屍溝壑的情形，即令倖存餘生者，亦呈嚴重營養不良的體質虛弱之態，於是當 1348-93 年間黑死病在全歐的蔓延且肆虐數十年之期，旋即導致大批人口為之亡斃（Craig, et al., 2009: 474-75）。在中西歐及德意志西部人口總數劇減下，自然再無多餘丁口向歐陸東部輸出，亦代表「中古時期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的紀元至此告終（Higounet, 1986: 329）。

約翰過世之後，其子查理在 1346 年被選為波希米亞及德意志國王查理四世（Charles IV, Holy Roman Emperor, 1355-78）。由於中世紀高峰期大批德意志人橫越易北河（Elbe）以東而進入了東部各地之後，歷經近兩世紀的開發拓殖之後，使得後來的德意志東部及中東歐地區，逐漸發展成為德意志世界的政經社及文化要地，波希米亞王國尤為最初之代表。卡爾四世甫一入主德王室中央之後，鑑於已無力掌控全境深陷分崩離析且強藩割據一

方的德意志第一帝國，遂傾全力於核心領域波希米亞王國的建設，在其厲精圖治之下，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及西利西亞步入了一段璀璨輝煌的紀元，尤以首府布拉格為然。透過先前東移的德意志市民階級對布拉格各項領域的貢獻，使得布拉格在卡爾四世的統治之下，呈現飛躍式的發展，此即歷史上的「第一次布拉格黃金時代」。卡爾四世首先在 1348 年建立德意志世界的第一所大學：布拉格大學，成為阿爾卑斯山以北最古老的大學，同時並大幅擴建布拉格王宮及市區，使得濱臨伏爾塔瓦河（*Vltava*，易北河上游的主支流）兩岸的布拉格成為一個美倫美奐的城市。當卡爾四世在 1355 年被加冕為德意志第一帝國皇帝之時，布拉格自然而然就晉升成為德意志第一帝國帝都之所在。

波希米亞王國盧森堡王朝在德意志第一帝國所扮演的絕對至尊地位，尤可在 1356 年卡爾四世所頒佈的『金璽詔書』（*Goldene Bulle von 1356*）中充分觀察出。在該年，卡爾四世以其作為德意志第一帝國皇帝兼德王暨波希米亞王的身分，廣招德意志各大領土諸侯與會，磋商會談時而出現爭議的德王選舉及其後加冕為德皇的方式，在取得了與會各方的大致共識之後，隨即將之定稿發佈。在這部隸屬德意志歷史上最重要官方文件之一的詔書內，首度將過去百餘年來實質上已然在運作、卻從未明載於文獻上的選舉制與血統制混合的選舉德王原則、德王由 7 大「選侯」（*Kurfürst*）所選出、日後加冕為德皇的各項程序，以及 7 大選侯所享有的各項特權等規定，正式形諸於正式的書面文件上，成為日後選舉德王的法律依據。由上絕不難窺見出，盧森堡家族掌控下的波希米亞王國作為中古晚期德意志政壇中第一要角地位（*Augustynowicz, 2010: 39*）。

從波希米亞王國在盧森堡家族中人統治下的步入巔峰盛世，以及布拉格成為德意志第一帝國盧森堡王朝的帝都所在，可清楚觀察出捷德兩民族從中古高峰期至晚期的緊密依存性。

## 伍、波希米亞德意志化、胡斯戰爭、及捷克民族意識

卡爾四世過世之後，其後續統治君主才能平庸，致令盧森堡王朝陷入中衰頹勢，甚至最後步向全境動蕩之境，此即胡斯宗教改革運動及後續所引爆的「胡斯戰爭」（Hussite War, 1419-34）有以致之。事件發端於捷克宗教改革者楊·胡斯（Jan Hus, 1369-1415）不滿於西方拉丁教會及其神職人員長期的腐化，因而試圖改革教會種種弊端，然而在此一過程中，觸發了一場遍及於波希米亞王國社會各階層的起事行動。

15 世紀初期的波希米亞王國，全境實正深陷於「德意志化」的危機之中，除了週遭山群地帶幾全為德意志農民及礦工所拓殖開墾之外，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境內各大城市的市政大權亦幾全為富裕的德意志市民階級所掌控，與此同時德意志神職人員亦主導著波希米亞的各大教區。捷克人在其故土幾乎全面淪為弱勢，因而一俟捷克宗教改革者胡斯遭火焚而亡後，隨即引爆捷克人在宗教上、政治上及社會上的對德意志外來勢力的全面反抗，從而激發了捷克「初期民族意識」<sup>2</sup>（incipient nationalism）的肇興（Graus, 1975: 206-209; Barraclough, 1984: 254; Nipperdey, 1998: 300-301）。

胡斯戰爭的導火線係由楊·胡斯試圖改革教會的腐化而起，胡斯是布拉格大學校長，久不滿於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各大主教座堂及教區買賣聖職、

---

<sup>2</sup> 此一概念見之於捷克史學家葛勞斯（František Graus, 1921-89）的著作之中，他認為不可將中古時期的「初期民族意識」與 19 世紀的「近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兩者間畫上等號。「初期民族意識」是一群文化背景相同的本土族群，在面對外來移入者佔有並壟斷所有層面的權益後，發自本能上的反感而所興起的一種排他情緒，本質上是一種保鄉護土的情懷。因此「初期民族意識」無論就伸張力、擴散性及持續性而言，皆難以及帶有侵略性的「近代民族主義」之項背。至於英國史學家巴拉克洛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84）則將中古時期出現的「初期民族意識」概念，定義為「初期的民族主義」，他採取與葛勞斯相同的觀點，認為中古德人移民拓殖於若干中東歐地帶與當地住民間的衝突，並非是種族或民族衝突，其本質完全無法與「近代民族主義」下的民族敵對衝突相提並論。另外，按照德國史學家尼普戴（Thomas Nipperdey, 1927-92）的觀點，「初期民族意識」的形成是一種天然產生的情感意識，是在一片語言文化背景相似的人群，在與其他相異語言文化的族群發生接觸之後，所產生的自我群體認知感，其產生的時間甚早，早在近代以前的（Early Modern Ages, 1500-1789）、甚至是中古時期即已有之。其與人為透過各種政治意識形態所建構出的近代民族主義，在本質與內涵上有極大的差異。

販售「赦罪券」(*Ablaszettel*)及高級教士生活奢靡等弊端，乃大力鼓吹教會的改革，力倡以聖經為教會唯一依歸、恪遵貞潔及清貧的教規並反對教會聚財等(Polisensky, 1991: 42)。其說普受廣大中下層階級所支持，未幾旋成廣大風潮。羅馬教會為扼殺其說，斥其為異端並招其至康士坦斯的宗教大會上進行答辯，逼其收回言論，然胡斯抵死不從，旋遭逮捕後，未久即橫遭火焚而亡。當時身兼波希米亞國王的德意志第一帝國盧森堡王朝皇帝西吉斯蒙(Sigismund, Holy Roman Emperor, 1433-37)，未能遵守其先前予胡斯人身安全的信諾，致而導致捷克人民群起反彈，其後數年間，波希米亞王國全域各地陷入嚴重騷動不安之態。

「第一次布拉格拋窗事件」(First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在1419年爆發，胡斯信徒闖入了正在議事的布拉格市政廳，並將數名市議員拋出窗外，胡斯戰爭於焉爆發。戰爭初期，胡斯信徒在其盲眼民族英雄楊·吉胥卡(Jan Žižka, 1360-1424)的領導下，打造出著名的「車隊堡壘」(*vozová hradba, wagon fort*)戰術，每每運用數輛乃至於數十輛農具車隊的靈活移動及連鎖佈防，阻撓敵方重裝騎兵的馳騁衝擊，接連七次瓦解並重創第一帝國及羅馬教宗所組成的十字軍攻勢，甚至趁勝而數度襲向波希米亞王國疆域以外之區域，試圖將胡斯宗教改革信念向外傳播(Higounet, 1986: 332)。不過皇帝及教宗在軍事鎮壓胡斯信徒失利後，決心採取離間策略對付之，在釋出大量政治利益的誘惑下，致使胡斯陣營內部產生內鬨及猜忌，遂分裂成為溫和派及激進派，溫和派成員以大學師生、貴族及市民階級為主，希望與羅馬教廷及德意志第一帝國當局締和。激進派則以農民、低階教士及城市下層階級為核心成員，則矢志持續對抗羅馬教宗及帝國皇帝。最後溫和派在胡斯教派鬩牆之爭的「里班尼戰役」(Battle of Lipany, 1434)中擊潰激進派之後，和談障礙始告排除，1436年的『巴塞爾公約』(*Compacts of Basel*)簽署後終而結束這場兵連禍結達16載之久的戰爭。

歷時16年的胡斯戰爭，可謂對波希米亞王國的捷德兩民族勢力的興衰，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首先在戰爭歷程中，大批波希米亞德意志人被殺被逐，使其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各大城市地帶影響力幾乎消失殆盡，德人勢力侷限至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週遭山群地帶(Higounet, 1986: 331-

32)，該區即日後被稱為「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的山群地帶。其後即使到了 16 世紀前期在哈布斯堡皇室入主波希米亞王國王位時，德人復又在波希米亞境內得勢，卻已無法扭轉捷克人的初期民族意識在其故土生根的情形。與之相對的，胡斯運動則代表著捷克民族的重生，胡斯戰爭喚醒捷克人的「初期民族意識」，即使戰爭結束後，波希米亞王國雖仍持續隸屬於德意志第一帝國之一部，未能全面贏得其獨立自主的地位。然而捷克語言文字及文化傳統終能自此長存，因而胡斯戰爭對捷克人而言，誠可謂為民族轉捩點，其價值實彌足珍貴。

## 陸、奕志登基、波希米亞朝代更迭、哈布斯堡入主

1436 年的『巴塞爾公約』簽署之後，雖然胡斯激進派勢力受挫，不過胡斯溫和派勢力依然強大，對於波希米亞王國仍具主宰力量。當盧森堡王朝西吉斯蒙在 1437 年過世之後，因無男嗣，波希米亞王國盧森堡王朝正式告終。歷經近 20 年的紛擾後，在 1458 年時波希米亞貴族波傑布拉德的伊日 (George of Poděbrady, 1458-71)，受到波希米亞王國的各大貴族及市民階級的大力支持而被選為國王。

不過儘管先前教宗及德皇為了瓦解胡斯派力量而向胡斯信徒溫和派讓步，但自始至終胡斯信徒始終被敵視甚至被視為教會異端份子，因而出身自胡斯信徒的奕志國王，在統治波希米亞王國期間不斷橫遭週遭各國君主所排擠。為了突破胡斯信徒在拉丁羅馬教會世界的困境，奕志決定訴諸基督教的情感，於是他在 1464 年時，提出基督教世界各君主應共組一個泛歐洲的基督教邦聯，建立起一個基督教「共同體」，如此將能達到基督教世界歐洲永久和平之局。奕志希望藉由基督教邦聯的出現，可以保障波希米亞胡斯教派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時期望藉由泛歐洲基督教邦聯的成形，阻擋土耳其人的企圖征服歐陸的野心。

儘管奕志的泛歐洲基督教邦聯的理想崇高，然而在當時信仰世界觀仍極為狹隘，以及歐洲各國正由封建國度逐步走向民族國家的道路上，國與國間皆為其自身利益而彼此征戰不休，所謂泛歐洲的思想在當時無疑是一

項不見容於時代發展的幻想，因此在奕志過世之後，該想法就隨之消逝不存。即令如此，在 20 世紀提及歐洲整合及歐洲聯盟發展的歷史淵源之時，波希米亞國王奕志·波德布拉德始終被尊為歐洲整合的歷史先驅者之一。

奕志·波德布拉德國王於 1471 年過世之後，波蘭王國雅捷佛王朝憑其強大政治實力而取得聖瓦茨拉夫王冠，成為波希米亞王國的下一個統治王朝，其後未久更進一步兼領匈牙利王國，進而造就從中古晚期一直至近代早期雅捷佛王朝的盛世。然而波蘭王國雅捷佛王朝同時兼領波希米亞及匈牙利王國的盛況維持並不長久。土耳其大軍在蘇萊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520-66*）的率領下，於 1520 年由巴爾幹半島北上，攻入匈境南疆。在莫哈契之役（*Battle of Mohács, 1526*）中，數量不及 2 萬的匈軍在土軍軍力勢如山崩的衝擊下，幾遭全軍覆沒之噩，同時領有波希米亞及匈牙利兩國國王的路易二世亦在遁逃之際溺斃於湍流之中。瓦解匈牙利殘部最後抵抗之後，土軍隨即攻陷匈京布達佩斯，將匈王國大半疆域納入轄下，鋒銳部隊進圍奧京維也納，是為「第一次維也納圍城戰」（*First Turkish Siege of Vienna, 1529*），幸賴奧軍尚能奮戰，稍挫土軍鋒銳，奧京始得保全。

然從 1540 年之後的 150 年間，匈牙利 2/3 以上的疆域為土耳其所掌控，至於其餘三分之一的所謂「（哈布斯堡）皇家匈牙利」（*Royal Hungary*），則由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統治，自此之後，匈牙利王國名存實亡，全境淪為土耳其及奧地利兩帝國所統治，歷時達 350 年之久。

波希米亞及匈牙利王國雅捷佛王朝的路易二世過世之後，哈布斯堡家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迪南一世（*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1556-64*），依照先前曾與匈王室所簽署的同盟協議而於 1526 年取得聖·伊斯特凡/史蒂芬王冠，同時也連帶掌握了聖·文瑟斯勞王冠，使得哈布斯堡家族此際一舉擁有了奧地利大公國、匈牙利王國及波希米亞王國三國的統治權，逐步晉升成為中東歐地區的強權。

## 柒、新教在波希米亞及布拉格、三十年戰爭爆發

哈布斯堡家族在 1526 年入主波希米亞王國之後，胡斯信徒轉入地下，卻仍持續堅持其革新教會的想法。時逢 1517 年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爆發不久，波希米亞全境隨之陷入騷動，先前沉潛民間的胡斯信徒因其教會改革理念而再度大肆活動，他們全力支持新教陣營，遂與其他新教派系包括路德教派及喀爾文教派互通訊息並密切合作，重新在布拉格及其近郊之地展開活動，他們後來被統稱為「波希米亞合一兄弟會」(*Jednota bratrská, Unity of the Brethren*)。由於宗教及政治因素，他們大力支持德意志境內的新教徒反抗哈布斯堡王室中央，並且在「徐馬卡爾登戰爭」(*Schmalkaldic War, 1546-47*) 中，全力支持新教陣營並出兵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然卻遭敗績，不過新教勢力仍能在波希米亞王國境內維繫。

在宗教改革及後續宗教戰爭時期，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德意志人與捷克人因大批改宗基督新教之故，使得兩民族的關係得到大幅度的改善，紓緩了過去胡斯運動以來的緊繃關係。他們從宗教改革浪潮開始，即聯手捍衛自身的新教立場，共同抵禦代表舊教勢力的哈布斯堡皇室中央，即令在徐馬卡爾登戰爭中失敗，他們仍相互合作而對抗哈布斯堡皇室的後續宗教壓迫。

波希米亞的新教徒與哈布斯堡王室間的緊張對立關係，一直要到魯道夫二世 (*Rudolf II, Holy Roman Emperor, 1576-1612*) 上台後才有轉變。1576 年魯道夫二世正式成為哈布斯堡家族族長並接掌皇位，試圖化解舊教中央與波希米亞新教臣民雙方間的對立態勢。魯道夫二世成長於當時天主教信仰摯熱的西班牙宮廷之中，及至其成年並返回奧地利掌政之後，卻能不受狂熱舊教信仰所驅使，反而試圖化解新舊教之間的歧異衝突，可謂是深受舊教信仰影響下的哈布斯堡家族中人的異類。

這名飽讀詩書及才華洋溢的皇帝極度不喜維也納，係因奧京當時是由尊奉舊教且立場僵固教的耶穌會所掌控，與之相對的，他對新教氛圍濃厚且學術氣息自由的波希米亞首都布拉格，則頗為青睞有加，於是在其任內，乃將首都遷往布拉格。這段從 1576 至 1611 年為止的魯道夫二世駐京布拉

格的 30 餘年時光，可謂是布拉格在歷史上，繼 14 世紀盧森堡王朝卡爾四世之後的再展璀璨輝煌的「第二次黃金時代」。在魯道夫二世大舉獎掖藝文活動的鼓舞下，大批美侖美奐的建築及各類雕刻繪畫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此外基於其身對天文學的喜好，因而知名的天文學家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及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皆受邀而成為布拉格宮廷嘉賓。其他各類人文及自然科學，同樣也受到魯道夫二世的大力推動而呈欣欣向榮之態，因此這段由其所促進的布拉格文化昌盛之期，也被稱為「金色布拉格」時代。

魯道夫二世將京都置於布拉格，更大力提倡波希米亞境內人文、自然及藝術的發展，且對新教徒抱持容忍態度，使其對波希米亞王國 30 餘年的統治尚稱平穩。時至 1609 年時，魯道夫二世甚至簽署並頒佈『聖詔』（*Letter of Majesty*），內容賦予了新教徒信仰自由的權利，然而波希米亞新教徒各大貴族決心趁魯道夫二世與其弟馬提亞斯相爭而權勢弱化之際，索求更多宗教及政治特權，魯道夫二世嚴拒之餘，決心派兵鎮壓，新教貴族遂轉而援引其弟馬提亞斯以為己助，終在 1611 年時成功聯手擊敗魯道夫二世。翌年魯道夫二世鬱鬱而終，馬提亞斯乃於同年 1612 年正式登基，是為馬提亞斯一世（Matthias, Holy Roman Emperor, 1612-19）。

馬提亞斯一世上台之後，哈布斯堡王朝中央即開始任命大批舊教人士主掌波希米亞的教務事宜，波希米亞新教徒在大感失望之餘，決心對抗馬提亞斯一世的統治及天主教勢力的進入波希米亞。於是兩者間的矛盾愈見激化，遂有激進的新教徒在 1618 年 5 月將 3 名皇帝信使從布拉格王宮所在的宮殿高窗上向外拋出的事端，史稱「第二次布拉格拋窗事件」（*Second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正式引發第一帝國皇室中央與波希米亞貴族及各等級間的衝突，成為「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48*）的導火線。

事端衝突之初，並無明顯勝方，然而當 1619 年，波希米亞各等級集會決議罷黜哈布斯堡家族在希米亞王國的統治，以及另選新教諸侯普法耳茲伯爵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 of the Palatinate, 1610-23*）為波希米亞國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 King of Bohemia, 1619-20*）。此舉引發哈布斯堡皇室強烈反彈，此際繼承馬提亞斯一世而接掌皇位的新皇腓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Holy Roman Emperor, 1619-37)，決心派出天主教大軍前往波希米亞進行鎮壓，於是三十年戰爭的第一階段「波希米亞-普法耳茲戰爭」（Bohemian Revolt, 1618-20）爆發。

### 捌、哈布斯堡王朝嚴控波希米亞、捷克民族意識重生

在苦候新教援軍不至，波希米亞的新教部隊終於在布拉格近郊的「白山戰役」（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 1620）中遭到支持哈布斯堡皇帝腓迪南二世的天主教聯軍所擊潰，波希米亞國王腓特烈一世出逃，史稱「一冬之王」（Winter King）。忠於皇室的天主教部隊隨即攻入波希米亞境內各地，對新教徒展開嚴厲的報復行動，捷克及德意志新教貴族及各等級勢力遭受重大打擊，28 名新教領袖橫遭處決，300 個新教貴族遭到逮捕及驅逐。哈布斯堡皇室趁此機會大舉削弱捷克貴族的舊有特權及剝奪其地產，轉將之分封予效命於哈布斯堡王朝及軍隊的舊教人士，捷克及德意志新教市民階級亦同遭池魚之殃，財產大舉被沒收，十數萬以上先前改宗新教的捷克及德意志新教市民階級被迫逃離波希米亞（Prinz, 1993: 213-14）。上述發展使得波希米亞王國原先仍保有的若干程度的自主性徹底消失，全境全為哈布斯堡王朝皇室所嚴格掌控。

在 1627 年，腓迪南二世頒佈『全境秩序重建法規』（*Verneuerten Landesordnung*），正式宣佈在波希米亞實行絕對專制主義的統治及尊奉天主教（舊教）為唯一的信仰，同時聖瓦茨拉夫王冠——即波希米亞王國的王位，由原本的選舉制改為世襲制，並由哈布斯堡家族中人所出任。原先設立於布拉格的總督府，亦在 1624 年遷往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維也納，由此觀之，波希米亞王國的地位在 1620 年的「白山戰役」之後，實質上已無異於哈布斯堡王朝轄下的一個省分。

至 18 世紀中期之時，哈布斯堡帝國中央集權的情況因德意志政局的變化而更趨於嚴厲，係因德意志東北方的另一強權——普魯士王國崛興有以致之。1740 年普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 1740-86）趁著哈布斯堡帝國皇帝卡爾六世（Charles VI, Holy Roman Emperor, 1711-40）逝世、其女瑪

麗亞·特蕾西亞 (Maria Theresia, 1740-80) 甫登基而遭列強質疑其繼承合法性之際，侵入了原屬波希米亞王國所屬領域西利西亞，引發了「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sup>3</sup>」(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48)。由於哈布斯堡帝國在戰場上接二連三失利，西利西亞所有權最終為普魯士所奪，為了穩固對其餘領土的控制，哈布斯堡王朝於是大幅強化對波希米亞王國的控制權，1749年時帝國當局更取消了早已名存實亡的波希米亞總督府，波希米亞王國政務完全由哈布斯堡皇室中央所掌控。

時至 18 世紀末期，波希米亞王國雖然受到哈布斯堡帝國的嚴密掌控，然而捷克的傳統民族文化在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卻逐步受到捷克知識份子的重視及發揚，這主要是受到「德意志浪漫主義」( *Deutsche Romantik*) 思潮的影響。德人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在 1780 年代時在其著作中強調民俗及語言對一支民族的重要性，民族就是藉由自身的語言及傳統文化所型塑而成。赫德的此種觀點得到當時德意志思想界廣大的回響，這就形成了「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時代風潮。

此一風潮不僅激發了後來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昂揚，亦種下 19 世紀前期包括捷克民族主義在內的中東歐各支民族主義思想的根源，係因赫德在其著作中同時強調，若廣大的各支斯拉夫人能擺脫外來的枷鎖，則各支斯拉夫人就能全面獲得解放，從而建立起自身的民族國家。此說不啻令尚處於外來統治的各支斯拉夫民族極感振奮。於是若干捷克思想家及作家開始鼓吹自身民族語言及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於此同時，捷克知識份子亦出現希望回復到 1620 年白山戰役以前，波希米亞王國在政治上及宗教上的自治地位的呼聲，不過當時此種想法並不意謂著要完全脫離哈布斯堡帝國而獨立，而是希望取回捷克人對波希米亞事務的自主權。這種思想在後來不斷地演進，從而在 19 世紀前期至中期之際就發展成為捷克民族主義運動。

<sup>3</sup> 包括第一次西利西亞戰爭 ( 1740-42 )、第二次西利西亞戰爭 ( 1744-45 )、及後續的「七年戰爭」( Seven Years' War, 1756-63 )、後者又稱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 ( Third Silesian War )。

## 玖、捷克民族主義的勃興及捷德民族矛盾

源自 18 世紀後期的「德意志浪漫主義」及拿破崙戰爭是近代民族主義在中東歐地區興起的兩大根源。前面曾提及，德人赫德著作對中東歐各支民族主義風潮的催化之功，赫德在其代著作《人類歷史哲學的理念》中，論述德意志民謠及語言的重要性，兩者具體體現了「人民精神」(*Volksgeist*)及「民族獨特性」(*Nationale Eigenart*)，一個民族就是藉由自身的語言及傳統文化所型塑而成，因此德意志人亦在共同的歷史發展中，藉由獨特的語言及文化所淬鍊而成 (Nipperdey, 1983: 300-301)。赫德的觀點對於當時德意志文人及思想家影響甚大，他們既震驚於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血腥及殘暴，因而遂對大革命之前的時代，尤其是中世紀賦予了極為美好的想像。此種思想背景下，德意志文人及思想家對德意志過往的歷史、語言及民俗文化賦予極為尊崇的地位，這就形成了「德意志浪漫主義」的風潮。

這股風潮尤其在 1806 年之後，激發了澎湃洶湧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浪潮，係因拿破崙大軍自該年佔領德意志全境之後，大肆橫征暴斂。德人在飽受屈辱之餘，對外來統治者產生強烈反感。於是德意志浪漫主義者所一再大力宣揚的，即德意志語言及民俗文化所具有的尊貴性，以及對過往德意志歷史文化自豪的訴求，乃經由法蘭西大軍佔領德意志的暴行而在全德各地全面發酵，遂引發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浪潮，終而激發德人大規模起義以對抗拿破崙的統治，最後在 1813 年的「解放戰爭」(*Befreiungskriege*) 中徹底擊敗法蘭西佔領軍。

這種根源於外來統治及外力鎮壓下而刺激德意志民族再生力量的現象，對於當時陷於異族統治的中東歐地區尤其具有啟發性的作用。由於德意志與中東歐地區地理相鄰，中東歐各支民族的菁英及知識份子藉由與德意志浪漫主義文人及思想家交流，在此一過程中，德意志浪漫主義思潮因而也就被引介至中東歐地區，使得中東歐各民族的知識界亦開始將其目光投射於自身民族的傳統語言、歷史及文化的關注上，從而展開了中東歐各支民族的文化復興熱潮，連帶的導致後續中東歐各支民族主義的風潮，捷克民族主義即在此種時代背景下而為之蓬勃繁興。

時序進入近代 (Modern Ages, 1789-1914)，在 19 世紀前期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統轄的波希米亞及斯洛伐克，首先出現具有「近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 思想的作品，許多作家或文人受到德意志浪漫主義的啓發，以及透過與德意志思想界的交流，開始重視自身民族過往的語言及文化傳統，並賦予其極大價值，例如後來被視為「捷克民族之父」的帕拉斯基 (František Palacký, 1798-1876) 的《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捷克民族史》，以及斯洛伐克學者寇拉 (Ján Kollár, 1793-1852) 的《斯拉夫的女兒》，皆為代表作。這些作家及文人以「泛斯拉夫」一詞作為凝聚各支斯拉夫民族情感的力量，希望藉此抗衡德意志民族主義在波希米亞擴張的壓力 (Thomson, 1965: 193)。然而在 19 世紀上半葉時，正處於「梅特涅體系」所維繫王朝家族統治的合法性地位、並反對任何更動現行體制的全方位控制之下，所有政治訴求皆受到無情打壓，即令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最初並不要求全面獨立，僅希望能擁有自治權，卻依然受到哈布斯堡帝國當局毫不容情的壓制。

直到 1848 年法國二月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爆發之後，全歐各地紛紛響應，次月德意志境內各地亦爆發革命行動，是為「德意志三月革命」(Deutsche Märzrevolution, 1848-49)，最終導致「梅特涅體系」為之崩解，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及民族主義者亦緣時在法蘭克福的保羅教堂召開「德意志民族大會」，討論未來德意志民族統一及民族國家建立方案，哈布斯堡王朝內的奧地利及波希米亞德意志人亦積極參與其中，分別派出許多代表與會。為了抗衡這股迫人而來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及德意志民族統一浪潮的威脅，在帕拉斯基的號召之下，哈布斯堡王朝轄下的各支斯拉夫民族代表亦齊聚一堂於波希米亞王國首府布拉格，此即「泛斯拉夫會議」(Prague Slavic Congress, 1848)。

這場會議進行中，革命浪潮正席捲全歐，不僅德意志民族主義勢力高漲，匈牙利亦有脫離哈布斯堡王朝傾向，哈布斯堡帝王朝正面臨全面瓦解危機。帕拉斯基等捷克民族運動的領導人物擔心，一旦哈布斯堡王朝崩解，則捷克人勢必難以面對強大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要求合併波希米亞的壓力，因而並不主張完全獨立，而是希望將哈布斯堡帝國由中央集權制轉化為聯邦制，一方面各支斯拉夫人在帝國內可享有自治權，另一方面完整的哈布

斯堡帝國架構又可提供各支斯拉夫人保護，此即所謂「奧地利斯拉夫主義」（Austro-Slavism）的理念。

然而在次年 1849 年挺過革命風暴的哈布斯堡帝國，隨即重回保守立場，聯邦之議無疾而終，哈布斯堡皇室重新實行絕對中央集權控制全境，這段從 1849 至 1860 年的十餘年之期，被稱之為「新絕對（君主）專制體制」。不過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由普魯士所主導的「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 Lösung*）德意志民族統一方案取得上風，尤其在 1866 年普奧戰爭中，代表「大德意志方案」（*Großdeutsche Lösung*）的奧地利因戰敗而被排除於未來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外，使得波希米亞得以解除被併入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威脅。不過波希米亞境內的德意志—捷克民族關係仍然日漸緊張，係因波希米亞工業化及商業的熱絡，使得捷克中產及勞工階級大量興起，在接受捷克民族運動人士的啓發之後，他們進而成為推動捷克民族運動的主力，強烈反對在波希米亞獨尊德語及德人享有優勢地位，要求捷德兩民族的權利須完全平等。

### 拾、萊塔河此岸德捷民族問題惡化及大德意志再起

1866 年奧地利因在奧普戰爭失利，而被排除在未來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外後，被迫在翌年 1867 年向哈布斯堡帝國境內另一支重要民族馬札爾人讓步，遂有「奧匈妥協」的締訂，建立起奧匈雙元帝國，將帝國全域以奧匈間的萊塔河（Leitha）為界而分劃為西東兩部分：西部「萊塔河此岸」（Cisleithania）的奧地利帝國，及東部「萊塔河彼岸」（Transleithania）的匈牙利王國，雙方共擁哈布斯堡家族統治者為君，君主在西部為奧地利皇帝，而在東部則為匈牙利國王。雙方除了軍事、外交及財政等涉及全國事務者由帝國中央所主導之外，其餘內政領域則各自擁有自身主導權（杜子信，2014b：18-19）。

至此哈布斯堡王室中央將關注焦點，轉向「萊塔河此岸」奧地利帝國的治理上，希望能解決棘手難解的德捷民族問題。從 1880 年代開始，哈布斯堡帝國中央先後推動布拉格卡爾大學二分為捷克語及德語學區、大幅降低

捷克人參與波希米亞議會選舉投票權的財產下限，最後甚至更進一步欲推動波希米亞各行政機關德語及捷克語雙語並行政策。

帝國中央的上述種種友捷政策，喚起了波希米亞廣大的捷克人正面回響，然而對於波希米亞德意志人而言，無異是一項晴天霹靂，尤其是德捷雙語並行政策。由於過去長期以來，波希米亞德意志人始終掌控著境內的政經社優越地位，早已塑造出他們對自身所操之德語及所屬的德意志文化高人一等的想法，並認定捷克語根本只是當地廣大的捷克下層及農民階級所使用的語言，因此學習向被其視為鄉巴佬及不入流的捷克語，無異是自貶身份。此外尚有另一深層之因，波希米亞德意志人深恐藉由帝國中央政府一系列友捷政策，將會導致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佔人口多數的捷克人影響力大增，從而使波希米亞德意志人失去其在此間長期所享有的政經社優勢地位，甚至淪為波希米亞少數民族的境地。

此際萊塔河此岸奧帝國境內的各地德意志人社群中，基於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因而政治傾向也日趨朝向濃厚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及大德意志思想而轉變。在 1882 年所公佈的『林茲綱領』(*Das Linzer Programm*) 中，他們疾言必須在奧匈帝國境內其他民族步步進逼的威脅之下，捍衛帝國境內德意志人的文化特性及民族利益。此種背景下，奧地利德意志民族內部之中，漸漸湧現應在奧匈帝國境內分割出德意志民族的領域，甚至未來不排除進一步融入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可能性，意即併入鄰國同屬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疆域之中，暹那勒爾 (Georg Heinrich Ritter von Schönerer, 1842-1921) 在 1879 年建立「德意志民族主義陣線」(*Deutschnationalismus*)，尤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激進德意志民族主義團體。暹那勒爾對奧帝國深陷於各支民族主義浪潮所造成的動蕩，以及其對居於人口少數的德意志民族之存續所造成的嚴重威脅，感受至深，因而力主奧地利德意志人，應力保其所群集之奧地利本土、以及環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週遭山群地帶的純粹德意志特性，未來兩地且應併入德意志第二帝國之中，俾恒久保障德意志民族在兩地的永續長存。他從不諱言對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蔑視，以及對

<sup>4</sup> 日後在 1891 年重新整併而成「泛德意志統一陣線」(*Alldeutsche Vereinigung*)。

德意志第二帝國霍恩索倫王朝的傾慕，甚至直接尊稱德皇威廉一世為吾皇。

在萊塔河此岸奧帝國境內的德捷民族敵對態勢，最後終於在『語言法規』（*Sprachverordnungen, 1897*）全面引爆。該事件肇端於，迅速躍升成波希米亞政壇一股不可忽視勢力的青年捷克黨，強烈要求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境內捷克語及德語的地位必須完全相等。帝國中央政府為了贏得該黨在他項政策的支持，遂初步同意德語與捷克語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兩地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

然而此一措施卻全面激起萊塔河此岸奧帝國的德意志民族怒火，維也納的帝國議會中在德裔議員的激烈抗議中成為了一片戰場，同時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境內的各大城市，尤其是首府布拉格皆爆發了德意志群眾的暴動。此一事件的衝擊性，甚且逾越了奧帝國國境之外而波及至德意志第二帝國境內，致而形成了一股泛德意志浪潮。基於聲援奧帝國境內的德意志同胞，毗鄰奧帝國邊境的德意志第二帝國薩克森地區的大德意志民族主義者，高唱著〈捍衛萊茵河〉（*Wacht am Rhein*）及〈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slied*）等象徵著德意志民族統一的歌曲，跨過邊界而進入了波希米亞週遭山群地帶的德意志民族聚集區，與奧境德人會合，聯手向奧帝國中央政府施壓。帝國政府在此種壓力下被迫撤回語言法規，然而甫除去德人憤怒的同時，卻換來捷克人的憤慨，深感遭到政府當局背叛的青年捷克黨人亦以癱瘓議會作為抗爭手段，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德捷民族對立之態，已成萊塔河此岸奧帝國的無解難題。

時至 1908 年年底，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德意志與捷克人長期以來的敵對，終於爆發成兩民族間的大規模衝突事件，歷經數十日的彼此攻擊混戰，最後留下了超過 300 人以上死亡，近千名受傷的駭人數字，這種非戰爭時期的高傷亡人數，清楚揭示出萊塔河此岸奧帝國境內德捷民族敵對的嚴重性。

## 拾壹、捷克斯洛伐克建國、波希米亞德意志人問題

哈布斯堡帝國的境內多元民族糾葛及境外他國同族兄弟介入的民族問題，終在進入現代（Contemporary Ages, 1914-）之後，全面引爆開來。1914年哈布斯堡帝國皇儲在巡訪帝國屬地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時，橫遭一名主張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波士尼亞塞裔所刺殺，奧匈帝國當局認定事件係因境外塞爾維亞王國操弄大塞爾維亞主義使然，從而對塞爾維亞宣戰，此舉引發一連串骨牌效應，歐洲列強紛紛加入戰局，從而導致一戰的全面爆發。然而因長期深陷各民族的激烈鬥爭下所導致的帝國體質孱弱，在一戰爆發後缺陷盡曝無遺。落後的軍事裝備及武器、不黯新式戰技及戰術，以及雜亂無章的指通與後勤系統，導致奧匈帝國軍隊甫一開戰，即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在各個戰場上幾可謂潰不成軍，各族裔軍隊成員無心戀戰，包括捷克人在內的大批斯拉夫諸民族軍隊成員成群向俄軍投降。直至 1914 年 12 月，在德軍穩住其東線的普魯士至德屬波蘭的戰線、並進而大舉越境支援奧匈軍隊之後，才終於擋住俄軍攻勢並穩定戰線。然而哈布斯堡帝國軍隊實力在戰爭爆發後的僅僅兩三個月之間，即損失了總數高達 4/5 的帝國步兵師及超過一半以上的軍官，傷亡總數幾達百萬之譜。至 1914 年年底，哈布斯堡軍隊幾已無戰力完整的部隊

奧匈軍隊也就在愈來愈仰賴德意志第二帝國部隊的大力增援之下，戰局才能有所進展。從 1915 年開始至 1918 年的近 4 年之期，德奧同盟國逐步取得一系列的軍事大捷，先後取得佔領塞爾維亞、席捲巴爾幹、深入俄羅斯，以及重創義大利等等輝煌戰果，然而這一切皆在德意志第二帝國軍力的投入及襄助下才有可能。在整個一戰期間，奧匈帝國與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名義上雖以「中歐強權」（*Mittelmächte*）的同盟國之名而並肩作戰，實則所有軍事行動的策劃，以及佔領地區軍政事務的安排，皆由德意志第二帝國軍方單方面所決定，奧匈帝國軍方可以說連協商諮詢的角色都不具備，充其量只是作為一具橡皮圖章，此種情形下，若言哈布斯堡帝國淪為德意志第二帝國的衛星國度，實亦不為過也（杜子信，2020：247-48）。

儘管德意志第二帝國撐起了中歐同盟國的戰局，然而由於美國在 1917

年底的參戰，投入協約國陣營之中，在大量兵員物資的支援下，使得戰局逐步逆轉。1918 年春季的德軍西線大攻勢受阻於協約國優勢兵力而終以失敗收場，在軍事失利及經濟崩潰下，使得哈布斯堡帝國內部深陷絕望之境，各民族抗議事件充斥全境，全境上下無不希望儘速從戰爭泥淖中解脫。尤其在 1918 年初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913-21）提出 14 點中的「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條款，宣示支持包括奧匈帝國在內的諸民族擁有決定自身民族前途的自決權利，對哈布斯堡帝國境內尋求獨立的各支民族而言，產生了強烈鼓舞的作用，境內包括捷克人在內的各民族紛紛以自身聚集區作為未來自身民族國家之所在，哈布斯堡帝國的崩解已成定局。此際哈布斯堡帝國的德意志民族聚集地，包括奧地利本土及環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週遭山群地帶的德意志人，在對哈布斯堡帝國前景絕望之餘，最初亦基於自身民族屬性而欲在未來與德意志威瑪共和國進行合併。奧地利與波希米亞德意志人在召開了德意志民族大會，並宣佈該會作為原萊塔河此岸奧帝國境內所有德意志人的代表機構之後，在 1918 年年底正式宣佈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Republik Deutschösterreich, Republic of German-Austria, 1918-19*）成立。

然而就協約國、尤其是亟欲復仇的法國而言，德奧兩國皆為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斷無可能在戰後還讓兩者透過合併而使其大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夢想成真。因此在此種前提下，德奧合併不僅橫遭嚴拒，甚至包括兩國傳統領域在內的整個德意志民族分佈領域，都受到了極為嚴刻的安排。於是大片德人分佈領域遂被併入由協約國所扶植的中東歐一系列新興的斯拉夫諸國之中，諸如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波蘭第二共和國，及第一南斯拉夫之中。原本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組成的兩大部分之一，即環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週遭山群地帶的近 350 萬德意志人分佈領域，即在此種情形下被劃入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為該國的少數民族（杜子信，2020：254）。

## 拾貳、蘇台德問題的產生及第三帝國兼併蘇台德區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一戰後的建國，對捷克民族而言，無異是重現民族光輝的一刻。由於 19 世紀前期以來，捷克民族主義者的敘事之中，一再將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境內的德意志人描繪為外來殖民者，指控他們從中古高峰期進入捷克以來，即對本土捷克人採取壓迫甚至同化的手段，意圖讓捷克民族逐步消失，幸而捷克人從 15 世紀胡斯運動以來即已覺醒並捍衛自身的語言及文化，然而自 17 世紀三十年戰爭之後，德意志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下，再次大舉進入波希米亞王國全域，並以統治者自居，將捷克人降為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並試圖將之「德意志化」。

此種敘事宣傳歷經近一個世紀之久的反覆烙印下，再加上過去幾十年以來在萊塔河此岸奧帝國的捷德民族鬥爭的負面觀感，使得大批捷克人在國家初現的當下，熾熱昂揚的民族情緒響徹雲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建國後的首任總統馬薩里克 (Tomáš Masaryk, 1918-35) 當時即道出：「我們—捷克人—終於創建了自己的國家，因此我國境內的德意志人國籍也就因此而確定了，這些德意志人最初是以外來移民者及殖民者身份而進入這片土地的」(Prinz, 1993: 386)。從中完全不難看出捷克人在極度自傲之餘，卻對境內最大少數民族且總數高達近 350 萬的德意志人抱持頗為負面的態度，在此不啻預見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建國後捷德民族關係的持續緊張形勢。

從捷克斯洛伐克國政運作之初，雖然在共和國國會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保留了 66 名議席給予波希米亞德意志人—蘇台德德意志人，然而除此之外，捷克政府卻也有意無意地漠視蘇台德德意志人的各項權益，<sup>5</sup>無論是憲法上的德語使用、德裔地主的土地持有及文化保存等等皆然。使得蘇台德德意志人不斷與布拉格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屢屢交鋒且摩擦不斷。不過基於

<sup>5</sup> 蘇台德德意志人的稱謂最早出現於 19-20 世紀之交的奧匈哈布斯堡帝國境內，最初是一種學術用語，係萊塔河此岸奧地利帝國的德意志學者用以區分帝國境內分佈於不同地域的德意志民族地區的三種稱謂之一：阿爾卑斯德意志人、蘇台德德意志人及巴爾幹德意志人。自一戰結束後，蘇台德德意志人的用語普遍被用以稱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全體德意志人身上，取代了先前的波希米亞德意志人的稱謂。

雙方的菁英及知識份子過去同在哈布斯堡帝國波希米亞議會共事頗久，對於透過議事上的協商折衝而勉強妥協的作法尚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因此在雙方溫和派的不斷努力奔走之下，總算能透過以蘇台德德意志人的菁英入閣捷政府中央，使之盡可能爭取蘇台德德意志人的權益而達到緩和雙方關係的方式。此種作法勉強得到差強人意的效果，於是從 1926-35 的 10 年間，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與蘇台德德意志人之間的對立關係，稍見些許緩和。

然而其間布拉格政府的政策反覆不定，時而在強硬派官員的主導下，在蘇台德地區通過嚴峻的法案，派駐大量捷克語行政官員進駐而解職德語官員，漸次削弱德意志語言文化的影響，這使得德意志人對中央政府不能無怨（Thurich, 1990: 50-51）。時至 1929 年時，情勢更形嚴峻，係因該年爆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大恐慌，導致捷克斯洛伐克的失業率暴增，從而引發了內政上嚴重的經濟及社會問題。此種經社危機對於捷克斯洛伐克政壇帶來極大衝擊，導致內閣政府人事更迭頻繁甚至垮台，後續新政府上台之際，為了維護並穩固政權，不惜訴諸族群問題而謀取政治利益，於是一再以強化捷克民族性及削弱蘇台德德意志人權益作號召，這使得蘇台德德意志人陣營中願意與布拉格政府合作的溫和派選票不斷流失，與此相對的，強硬派的選票則不斷增長。

此種發展最後導致嚴重後果，在 1935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會大選中，強硬派的「蘇台德德意志黨」（*Sudetendeutsche Partei, Sudeten German Party, 1933-38*）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國會 66 德語議席代表中豪取 44 席，成為蘇台德德意志人陣營中的主要代表。基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德意志民族愈來愈加深的民族生存危機感，蘇台德德意志黨黨魁亨萊恩（Konrad Henlein, 1933-38）雖一再聲言效忠於布拉格中央政府，然於此同時他也主張，希望在保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版圖完整的前題下，賦予蘇台德德意志人地區高度自治權。然而此種訴求遭到布拉格政府所嚴拒，使得雙方的緊張態勢急遽升高。時至 1936 年 5 月，布拉格政府強行通過了『國家防禦法』（*Law on State Defence*），取消了许多蘇台德德意志地區原有地區性自治的治安及行政單位，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布拉格中央的大批捷克軍隊、警察及監理機構的進駐，遂引爆了蘇台德德意志人對布拉格中央的強烈怒火，

導致雙方衝突一觸即發。

蘇台德德意志人與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的緊張對立關係，看在鄰國德意志第三帝國元首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眼中，無疑是一項將其長久以來所抱持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野心付之實現的絕佳良機，於是自 1936 年年底開始，決心全面介入並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目標則在吞併蘇台德德意志人地區。在國社黨人背後大筆資金的持續挹注下，蘇台德德意志人愈受第三帝國的吸引，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離心離德，抗爭手段因而愈趨激烈，然而這些抗爭在布拉格政府的鎮壓下終究以失利作收，卻愈使蘇台德德意志人將其歸屬希望投向德意志第三帝國（Prinz, 1993: 393-95）。

1938 年 3 月德意志第三帝國在「合併奧地利」（*Anschluss Österreichs*）之後，旋將焦點轉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當蘇台德德意志人的新一波抗爭再度橫遭布拉格政府所鎮壓、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宣佈局部軍事動員之後，希特勒隨即在同年 9 月宣示，第三帝國絕不坐視蘇台德德意志人繼續受打壓，為了捍衛所有德意志民族的權益，必要時德國將以軍事手段介入，「蘇台德問題」（*Sudetenfrage*）於焉產生。

雖然先前捷克斯洛伐克與法國、蘇聯、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皆訂有盟約，然而各國皆未予捷克斯洛伐克堅定的出兵承諾，法國期待能與英國一起向納粹施壓，但英國無意為了中歐一小國而與德開戰，法國因而不願單獨承擔責任。最後為了避免戰爭爆發，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 1937-40）試圖安撫希特勒，當年 9 月下旬先後三度與希特勒見面，期待獲其善意回應。然而此舉無異與虎謀皮，希特勒此刻已然不只滿足於蘇台德地區的全面自治，甚至要求直接將之併入第三帝國疆域之中，張伯倫在折衝過程中唯一的收穫，僅得到希特勒同意延後德軍的軍事行動而已，於是遂有慕尼黑會議的召開。

1938 年 9 月 29 日德國元首希特勒、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英國首相張伯倫及法國總理達拉第四國領袖在南德慕尼黑召開會議，在義大利全面支持德國狀況及英法作戰準備不足之下，只好對希特勒採行綏靖政策，次日 30 日正式締定『慕尼黑條約』（*Munich Agreement*），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正式將蘇台德地區割讓予德國，布拉格政府在遭到盟友出賣下深感大勢已去，無奈只能依約行事，蘇台德區遂遭德意志第三帝國所合併。然而兼併蘇台德區不過是希特勒在朝向建構大德意志「生存空間」的初期階段而已，事實證明，環山皆佈有軍事防禦要塞的蘇台德地區一失，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核心要地帶根本無險可守，於是半年之後，1939 年 3 月在希特勒威脅恫嚇及隨後德軍長驅直入之下，布拉格政府最後屈服投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瓦解，捷克遂淪為第三帝國直屬的「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保護國」（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 1939-45），至於斯洛伐克則在第三帝國的安排下，成立斯洛伐克獨立國，納入軸心國的陣營之中。秉此以見，西方各國在面對強權獨裁者的侵略行徑，一再採行退讓的綏靖政策，最終不過是割肉餵虎，徒然增大獨裁者的野心胃口而已。

### 拾參、第三帝國佔領下的捷克及捷克人的抗爭

就希特勒及其國社黨人的種族意識形態的觀點而言，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捷克人雖屬「次人」（*Untermenschen*）的斯拉夫人種，然因其在歷史上長期與德意志人互動密切，致而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文明基礎，尚屬斯拉夫人種之中的較開化者，因此可准予保留較優秀的 1/3 捷克人，令其「德意志化」，另外 1/3 智識不足者，未來則需驅往東部歐亞之交的邊地，至於最後的三分之一品質低劣者，包括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猶太人及吉普賽人等等，則應集體送往死亡集中營消滅之。

基於此種種族意識形態原則的指導下，於是第三帝國從一佔領捷克人領域開始，即不斷升高了同化、鎮壓及逮捕措施等行動，尤其當 1939 年 9 月 1 日德侵波蘭而導致二戰的爆發後，第三帝國更形強化對各佔領地的嚴密控制。即令如此，捷克人在國社黨人的高壓統治下，為了捍衛自身民族性的存續，仍無畏地選擇抗爭行動，尤以大學生、知識份子及各階層菁英人士為然。1939 年 10 月底，各校大學生以紀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 21 週年為名，掀起了大規模且蔓延全境的抗爭事件。國社黨人未料到先前始終未曾抵抗的捷克人，竟發動規模如此浩大的抗爭活動，為了維護開戰後的

第三帝國所有控制地區的穩定，國社黨人決心採行大規模的逮捕及遣送集中營行動。

於是國社黨人在鎮壓學潮一結束，立即發動對捷克各校大學生、知識份子及各階層菁英的逮捕及迫害行動。其後這種逮捕、迫害，甚至處決捷克各界菁英及知識份子的措施，尤其在 1941 年 9 月底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1941-42）成為副總督及總督的職務代理人、而掌控了整個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保護國之後，更是達到巔峰之境。這名日後在 1942 年 1 月主持柏林「萬湖會議」（*Wannsee Konferenz*）、並制定了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的猶太人大屠殺首謀，此際以所謂「分開（知識份子）及控制（普通平民）」（*divide et impera*）標語的雷厲風行措施下，捷克全境知識菁英逃生無門，盡皆落得階下囚及打入集中營的命運。國社黨人的此種迫害暴行，可謂從佔領捷克全境以來，延續五年多的控制之期而不輟，最終種下捷克一整代菁英份子橫遭剷除的惡果。據統計，僅僅在被捷克人冠以「布拉格屠夫」的海德里希掌控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之期，即有高達 36,000 名以上的捷克知識菁英橫遭殺害。海德里希的此種暴行，無疑地種下了捷克人內心中強烈的反德排德情結，其後果將會在二戰結束後，以一種大算總帳的方式回報在世居捷克境內數百年之久的德意志民族身上。

海德里希不僅對捷克菁英人士大舉迫害，同時亦將大量捷克勞動階級及平民送往各地軍需工廠，令其生產大批軍械物資，以供應各戰線的大量軍需，這些捷克勞工皆承受工作量超載及工作環境惡劣等非人道的待遇。於是透過迫害捷克菁英階級及抽離基層勞工的雙管齊下手段，試圖將捷克境內的地下抵抗運動消弭瓦解於無形。不過海德里希高壓統治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惡行，終為其引來殺身之禍，此際流亡在英國倫敦的捷克流亡政府最後派出反抗人員，進入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保護國，最後成功地在 1942 年 5 月 27 日刺殺了海德里希。雖則如此，國社黨人後來採取的報復行徑，益使捷克人民再受浩劫（Prinz, 1993: 409）。

其後隨著第三帝國在二戰中後期各戰線的逐步失利，國社黨人榨取各地佔領區的人力物力資源更形緊迫，捷克大批勞工甚至被送往德國境內，在短時間內被迫從事各類軍需物資的生產製造，在惡劣的工作環境及盟軍

大舉轟炸的危險下，也造成許多捷克人命喪異鄉的悲劇。

在國社黨人佔領及二戰後期時，唯一能讓捷克人免於像其他中東歐各個民族的悲慘遭遇的是，在蘇聯紅軍西進的過程中，其他同樣在國社黨人佔領下或淪為軸心國陣營的中東歐各民族所在國度，皆遭到紅軍「大炮主義」的無情摧殘而化為廢墟，然而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則能因週遭山群環抱而倖免於難，蘇軍直至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國投降之際，都被阻於兩地的叢山峻嶺之外，使得捷克各大城市建築及歷史文化因而能幸運地長續久存。

#### 拾肆、貝內許法令、及蘇台德德意志人被驅離

二戰甫結束，基於國社黨人佔領全歐各國期間所犯下的各種暴行，於是全歐各國人民激烈的仇德情結幾乎在瞬間全面爆發開來，捷克全境亦不例外。在捷克境內各大城市內的德意志市民此際皆遭到無情的報復攻擊，大批德人遭致虐殺而橫屍街頭，其財產則遭充公。總計在戰爭結束的數月內即有高達數萬名的德裔市民死於非命，然而對捷克境內的近 350 萬德意志人而言，更為悲慘的命運則在後續數月之後接踵而至。

戰勝國美英法蘇四國首領齊聚在德國柏林近郊的波茨坦（Potsdam）召開會議，俾重建戰後歐洲新秩序。在會議中首先決定了中東歐各國的疆域重劃，由於從東歐到中東歐各地都已在紅軍的直接控制之下，史達林因而決心將歐陸東半部納入蘇聯共產集團的掌控，其後遂有『波茨坦條約』（*Potsdam Agreement*）的簽署。首先在俄波及德波疆界問題上，蘇聯將原屬波蘭東疆的白俄西部及烏克蘭西部吞併，波蘭則向西取得奧德河（Oder）及其支流奈瑟河（Neisse）以東的前德國東部省份作為補償，至於波羅的海南岸的原屬德國飛地東普魯士（*Ostpreussen, East Prussia*）省則分割為二，北部割予蘇俄，南部則為波蘭所併。其次在俄捷邊界上，蘇俄取得原屬捷克斯洛伐克東邊的喀爾巴阡-烏克蘭（*Carpatho-Ukraine*）地區。最後在巴爾幹地區部分，蘇俄亦從羅馬尼亞取得第聶斯特河（*Dniester*）以東大片領土（*Thurich, 1990: 92-96*）。

除了疆域重劃之外，為了使各國新劃國界與民族分佈領域一致，避免再

次發生類似像一戰後中東歐各國內政上的少數民族爭端，於是決定實施強制的民族遣送行動，將各國境內的大宗少數民族遷往同民族的他國境內，以絕後患，其中尤以世居於中歐至中東歐各地的德意志民族受禍最慘。在這場人造的民族大遷徙之中，總計高達 1600 萬左右的德意志人，在戰後的兩三年之中從其世居數百年之久的中東歐各國原鄉被逐離出境。尤為悲慘的是，在戰後全歐一片仇德排德氛圍中，他們的迫遷西行之路實滿佈荊棘，沿途屢屢蒙受各國軍民的肆意攻擊，不乏斃於鋒刃，甚或填屍溝壑之景象，最後總計大約 300 萬人命喪於西遷德奧之途（Dralle, 1991: 244）。

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仇德反德氣氛同樣熾熱，在強大民意作後盾下，布拉格政府不僅迅速採納波茨坦條約的相關規定，甚至再加頒法令強化之。戰後流亡歸國後再次成為總統的貝內許（Edward Beneš, 1945-48），在 1946 年簽署了『貝內許法令』（*Beneš Decrees*），除了極少數例外，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令將境內幾乎全部的德意志人驅離出境，於是近 350 萬的蘇台德德意志人至此被迫拋棄其原鄉，向西遷往時被盟軍所分區佔領的德國及奧地利境內（Thurich, 1990: 104-105）。絡繹不絕的德人難民潮從捷克斯洛伐克各地幾乎是被暴力強行逐出家園，其歷程一如上述所言，橫遭捷克軍民各種攻擊，在留下無數死傷之後，整個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德意志民族聚集區可謂一夕間遭徹底根除，亦代表數百年來植根於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德意志文化，在二戰結束後為之消逝不存，更是意謂著捷德兩民族共築的數百年之久的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互動記憶，至此被國際及捷克的政治決定所全面抹除。

## 拾伍、結論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以來，每每在論及捷德民族歷史的互動史上時，總會出現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方極力強調德意志人在中古時期即已稟具各領域的卓越長材，是故得以為波希米亞歷朝君主所欽羨，從而將之援引入境，以協助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全域的疆域開發，而德意志人確也不負君主之所望，歷經數十至上百多年的胼手胝足及辛勤耕耘後，創造出成果斐

然的開發成就，致而澤披全體捷克民族，使得波希米亞王國成為富甲一方的壯盛國度，從中不難見證了德意志文明的優越性，因而捷克人應感謝德意志人的文明教化之功。另一方則全力駁斥德人對捷克的開發之功，從而提出截然相反的論題，他們認為中古時期波希米亞王國歷朝諸君的援引德意志人入境，是犯下一項致命的錯誤，因為這些移入的德意志人並不懷好意，他們運用各種奸巧詭詐及強取豪奪的手段，而對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全域作極盡壓榨之所能，從而在捷克民族的故土內打造出一個前進基地，為數百年之後的近代德國兩度「向東壓進」(*Drang nach Osten*) 行動，充當尖兵前導者的角色，因此這些寄居在捷克境內的數百萬德意志人可說根本就是德國的第五縱隊。

上述這兩種全然由自身民族主義角度出現、長期盤據在德捷學政界的論點，可說主宰著各自歷史敘事長達一個多世紀之久，致使歷史上的捷德民族互動史的真實本貌，始終難以客觀呈現。據此，當代捷克史家凱熱(Jiří Kejř, 1921-2015) 在研究數百年來的捷德民族關係史時，即曾有感而發的慨歎道，互動長達 700 年之久的捷德民族關係，在受到近代民族主義激情的衝擊，使得捷德兩方的史家在詮釋研究這段歷史時，總不免受到深植於心且根深蒂固的自身民族情感所驅使，從而以敵對仇視角度來詮釋過去數百年的捷德民族互動關係。然而若全以過去所遺留的各類歷史文獻及典籍為本而深究之，則不難從中發現一項無可辯駁的實情，即 19 世紀中期以前捷德兩民族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互動，除少數時期及偶發案例之外，其實並無太多緊張對立、甚至是敵對衝突狀態的發生。因此當前的歷史學者在重新檢視這段歷史時，實應擺脫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在民族主義激昂情緒下所受到的牽累，從而以各項原始史料及最新考證資料為本，以持平客觀的角度來勾畫出當時的可能的互動情境及圖像，方是當前學界最迫切的任務(Seibt, 1983: 48-49)。

事實上在本文探究捷德民族數百年歷史的互動始末之後，再對照上述的這段文句，確如凱熱之所言，近現代以來的捷德出版品在處理到過去兩民族關係史時，的確滲入太多的民族主義觀點於其間，在民族主義派史家的描繪下，捷德兩民族似乎從歷史上接觸之初即已採敵視態度而對立，也

正因為這種帶有鮮明民族情緒的詮釋角度，致使過去兩方的可能真實互動面貌，從而遭到捷德雙方學政界的漠視而長期隱而未見，這不僅是歷史研究上的一項頗大缺失，甚至亦有礙於捷德民族關係的正常化發展。

直到 1970 年代的冷戰後期，尤其是 1989 年中東歐各共黨政權的全面瓦解之後，凱熱的呼籲漸漸出現了具體的回響，係因隨著東西意識形態對立的不再，歷史上捷德民族互動史的可能真實面貌，在捷德雙方學界的努力下，緩步地去除民族主義因子的牽累，各自依照原始檔案文獻的記載而修正敘事的角度，從而使得持平客觀的歷史專著及各類出版品能夠持續問世，對於消弭昔日的敵對刻板印象，委實貢獻匪淺。據此，本文若從凱熱的去民族主義化的脈絡而出發，仔細審視捷德民族數百年的互動史，大致可歸納為如下三階段的發展：

第一階段是從中古高峰期至中古晚期，此一階段中，波希米亞普熱米索王朝諸君基於境內疆域開發之需求，而大力召喚德人入境開發拓殖，這段歷程係以和平面貌而問世，並無捷德族群磨擦事件，雖到中古晚期時的胡斯運動爆發後，出現捷克人的排德反德情結，然而這種捷克「初期民族意識」的出現，基本上是一種反對外來特權者排擠本地人權益的一種情緒反應，並不具有持久性特色，隨著胡斯運動消寂之後，捷德兩族群曾一度出現的對立，即逐漸消失。

第二階段則是近世，在這個階段中，因宗教改革的爆發，波希米亞王國境內的捷德兩族群同時大規模的皈依基督新教，隨後並攜手反抗舊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中央的威逼，因而兩者間呈現緊密合作的態勢。其後哈布斯堡王朝在大舉鎮壓新教徒而掌控了波希米亞王國的政權之後，包括捷德兩族群的新教徒俱受迫害及流放，境內僅留捷克舊教徒並引入許多尊奉舊教的德意志人入境，在宗教信仰相同且哈布斯堡王室的單一信仰控制之下，捷德兩族群亦同為臣民而無由產生鴻溝。

第三階段則是近代至現代之時，進入這個階段之後，由於「近代民族主義」浪潮席捲全域，捷德兩民族皆處於此種強大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出現各自想要建立起自身民族國家的訴求，然卻因兩民族分佈領域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犬牙交錯，再加上哈布斯堡王室中央拒絕分裂自身領地，遂使捷

德民族關係逐步惡化，甚至進入「民族鬥爭」的現象。隨後至一戰結束後，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卻因難以處理蘇台德德意志人的少數民族問題，致而惡化至二戰前夕的德併蘇台德區及捷克全境，其後在二戰國社黨人的高壓政策及大規模迫害捷克人的狀況下，大大增強了捷克人反德情結，於是也種下二戰結束後，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將 300 多萬的蘇台德德意志人逐離家園的惡果。

最後在文末尤需一提的是，在今日捷德兩國政府全力強化歐洲一體化及強化歐洲認同的背景下，捷德兩民族的諒解行動也漸漸獲得廣泛的回響，此由近幾年來捷克官員數度參與在德國巴伐利亞的蘇台德德意志人組織的聚會，並以「親愛的同胞」(*Liebe Landsleute*) 稱呼之，可明確窺見捷克官方立場的轉變。因此可預見的是，未來捷德兩國兩民族應將能更以持平客觀之態，共同面對長達 800 餘年之久的捷德民族互動史。

## 參考文獻

- 杜子信，2014a。〈奧匈雙元帝國的民族問題與危機〉收於王英男、陳靜瑜、杜子信、陳鴻瑜、周惠民、李登科、周雪舫《歷史知識——行家開講世界史》頁 15-21。台北：三民。
- 杜子信，2014b。〈薩爾問題：德法諒解及歐洲整合的關鍵〉《成大歷史學報》46 期，頁 225-90。
- 杜子信，2020。《奧地利史：藍色多瑙國度的興衰與重生》。台北：三民。
- Augustynowicz, Christoph. 2010. *Geschichte Ostmitteleuropas: Ein Abriss*. Wien: Braumüller.
- Bahlcke, Joachim. 2009. “Böhmen und Mähren,” in Harald Roth, ed. *Studienhandbuch Östliches Europas: Geschichte Ostmittel- und Südosteuropas*, Band I, pp. 114-25. Wien: Verlag Böhlau.
- Barracough, Geoffrey. 1984.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Craig, Albert M., William A. Graham, Donald Kagan, Steven E. Ozment, and Frank M. Turner. 2009. *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s*.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 Davies, Norman. 1996. *Europe: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mandt, Alexander. 1998. *Geschichte der Spätantike: Das Römische Reich von Diocletian bis Justinian 284-565 n. Chr.*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 Dralle, Lothar. 1991. *Die Deutschen in Ostmittel- und Osteuropa*.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 Buchgesellschaft.
- Fritze, Wolfgang Hermann, Ludolf Kuchenbuch, and Winfried Schich. 1982. *Frühzeit zwischen Ostsee und Donau: Ausgewählte Beiträge zum geschichtlichen Werden im östlichen Mitteleuropa vom 6. bis zum 13. Jahrhundert*.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Graus, František. 1975. *Lebendige Vergangenheit: Überlieferung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n Vorstellungen vom Mittelalter*. Köln: Verlag Böhlau.
- Helmedach, Andreas. 2009. “Slowenien/Krain, Görz, Untersteiermark und Südkärnten,” in Harald Roth, ed. *Studienhandbuch Östliches Europas: Geschichte Ostmittel- und Südosteuropas*, Band I, pp. 390-97. Wien: Verlag Böhlau.
- Higounet, Charles. 1986. *Die Deutsche Ostsiedlung im Mittelalter*. Berlin: Siedler

Verlag.

Nipperdey, Thomas. 1983.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 München: C. H. Beck.

Polisensky, J V. 1991. *History of Czechoslovakia*. Praha: Vydala Bohemia International.

Prinz, Friedrich. 1993.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Böhmen und Mähren*. Berlin: Siedler Verlag.

Seibt, Ferdinand. 1983. “Die Deutsche Siedlung im Osten: Träger bürgerlicher Lebensart in Schlesien, Böhmen, und Südosteuropa,” in Hans-Ulrich Engel, ed. *Deutsche unterwegs: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Ostsiedlung bis zur Vertreibung im 20. Jahrhundert*, pp. 41-73. München: Günter Olzog Verlag.

Thomson, David. 1965. *Europe since Napole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Thurich, Eckart. 1990. *Schwierige Nachbarschaften: Deutsche und Polen – Deutsche und Tschechen im 20. Jahrhundert*. Stuttgart: Verlag W. Kohlhammer.

# The Bohemian Kingdom's Policy of Recruiting Germans in Middle Ag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zecho-German National Problem

Tzu-hsin T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Minxiong, Chiayi, TAIWAN*

## Abstract

During the High Middle Ages, the Kingdom of Bohemia recruited a large number of skilled Germans to settle its territory. This policy brought widespread benefits to the entire kingdom. The substantial tax revenue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power of successive rulers but also established Bohemia as a dominant force in Germany and eve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With the large-scale influx of Germans and their establishment throughout Bohemia, the German-populated areas underwent a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Germans becam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Bohemia and Moravia.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modern era, frequ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Czechs and Germans became commonplace in the history of Bohemia and Moravia. During this 800-year history, the two sides, who had long coexisted peacefully, gradually shifted from peace to conflict, from friction to confrontation, and finally to hatred and hostilit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nationalism.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is centuries-long history of Czech-German relations, starting wit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since the Middle Ages, hoping to unravel one aspect of the complex ethnic conflict in East Central Europe in modern times: the origins of the Czech-German national struggle and the Sudetenland question.

**Keywords:** Kingdom of Bohemia, Moravia, Czech-German relationship, Sudetenland Question